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吴 苗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西方中心论”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典型表述。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世界体系视角来看,“西方中心论”有其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发展现实,也会限制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建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使文化和话语也成为分析世界发展和国家关系的新的认识论基础。在对“西方中心论”思维范式的质疑中,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则得到更多肯定。中国发展话语既反映了一般发展规律,又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建立在发展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发展话语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消解,同时体现了对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关键词:“西方中心论”;中国发展话语;世界多元发展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424-07

“西方中心论”^①认定的发展一直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作为参照,尤其在关于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发展方面带有强大的优越感。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不利于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上曾出现过一种论断,即“主权过时论”,认为国家对其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能力正在减弱,整个世界的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唐士其^[1]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跨国资本

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压力,加之它们自身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更不能片面理解各种关于超越主权的理论,相反必须在某些方面坚持甚至强化自己的国家主权,否则只能加深自己在国际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平等,而且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灾难。”在这种争论中,一国的 development 道路及发展话语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实质上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全球分配正义论者也认为其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②。中国发展话语既要应对“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同时在推动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其个性与共性,并发挥建构性作用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收稿日期:2018-05-20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ZH185)

作者简介:吴 苗(1976—),女,陕西延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发展、发展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

①“西方中心论”最早来源于现代化发展理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后,认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走相同的发展道路,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复制。在这种理论惯性与思维的主导下,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存在自主性,只是对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模仿和复制。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简称“西方中心论”。

②也有学者讨论了发展中的全球正义问题,如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机构的设置、全球共同安全、全球分配正义等问题。如查尔斯·琼斯的《全球正义:捍卫世界主义》(1999)、科克肖·谭的《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2004)、戴维·米勒的《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2007)、吉莉安·布洛克的《全球正义:世界主义的视角》(2009)等著作。全球正义的讨论中,世界主义关注国家基本权利和全球分配正义,而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共同体立场则认为,应该给同胞更多的偏爱与关切。这两派的对立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中分配正义的理解分歧:西方的殖民主义破坏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如何补偿的问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存在不公正性,还要不要维持。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角度看这些问题的认识都不相同。笔者认为,一元化的理解肯定是不全面的。

一、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危害

西方普世价值概念中的西方,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西方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是西方强国话语霸权的一项重要攻略。西方普世价值被包装成世界各国价值体系的标准模式,客观上促成了世界话语体系的一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追求自己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发展话语树立起一个标杆,成为大家学习之榜样,压制了不同的声音,实质是强国话语霸权的表现。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曾说过,美国价值观驾驭世界贸易组织会产生不良结果。他认为:“美国力图通过国际组织‘按自己的构想’建立世界秩序,而这又是建立在大棒政策基础上的。‘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本身就隐含着美国政府可能会随意破坏贸易协定。当美国巨型公司掌握世界通讯业、金融业和食品业时,大家自然相安无事,而一旦贸易协定和国际法触犯了这些强人的利益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历史教训就会重现。”^[2]他对美国价值观胜利操纵世贸组织所产生的预期结果总结为: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为美国大公司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了便利;使商业和富人获益;使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为对付民主所产生的威胁提供了新式的和潜力强大的武器。世界近年来的发展态势,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征,已经很好地印证了他的看法。

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政治发展道路也是由本国的发展实际情况决定的,也具有本国的独特性。可是,现在却将这种个体经验推广成为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则,将特殊性认定为普遍性。这种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是在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就逐渐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原则。就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来看,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对世界上其他与其政体不同的国家的发展,颇多非议。美国也凭借其一国的话语霸权,占据话语制高点,提出对本国有利的国际交往原则;或借机打击一些发展中国家,迫使其国内与国际的相关政策作出对美国有利的改变。

根据国际上国家间交往正常的原则,国家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利的,相互磋商,共同处理一些相关事务。但是,在“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化发展话语控制下,弱小的国家不存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条件,强

国话语成为普世价值,必须遵守。在这种情况下,弱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逐步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其影响世界的能力进一步削弱,最终沦为霸权强国的从属国,丧失话语权。弱小国家关于本国的发展道路被霸权强国认为不是合理的,在国际上也不被认可。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主要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国发展理论并不能持有自信的态度,引发的后果就是对本国发展道路的不自信。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经历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时世界的发展话语体现为美国和苏联所持话语的二元对立。两个超级大国在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时,也出现了美、苏的二元化话语的激烈交锋。反映在国家关系上,美、苏由于话语意识形态的不同,各自拥有本国的一批卫星国。这些卫星国的发展道路,基本上是在霸权大国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缺乏自主探索。苏联解体后,苏联影响下的东欧一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顷刻瓦解,就是这个原因。“在美国方面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着民主价值观取得了永久性全球胜利。”^{[3]449}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展话语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作为真理和正义的价值准则,不断作为西方的文化攻略在全球推广开来。这个过程,使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从属地位进一步加强,西方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继续得到强化。世界的发展话语从美苏的二元对立进一步转向“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化。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导致的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不同国家的多样化发展道路被霸权国家的单一发展道路所代替。这种移植的道路不符合每个国家和民族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结果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探索的其他发展道路,因不符合西方特定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否定的标签,还被霸权国家非议甚至干涉。不管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探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世界认同的缺乏。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世界认同的缺乏直接导致这些国家自我认同的缺失,对本国的发展道路和努力会出现自我否定。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然,苏共的垮台有自身的原因,但西方对苏联的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转变起了直接的推动和干涉作用。在西方强大

的宣传攻势下,苏联国内出现了对本国发展道路的自我否定,最终根据西方的意图转变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大国苏联尚且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自我发展的认同更易受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的影响。

从本质上来说,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并不是真理的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同的实践检验出不同的真理。没有绝对性的真理,真理都是有相对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都要根据革命实践的变化来修正他们的理论,使之更为科学,更适应新的实践。所以,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并不科学,它其实来源于霸权强国的价值观输出,并且背后经常伴随有物质诉求。西方价值也只是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一种概括,可能更为适合其本国的发展。这种价值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它是西方国家人民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作为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如果适合了美国的发展,那么美国的发达及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就是证明。但是,如果美国向其他国家强行进行价值输出,就不具备真理性了。真理是有时空条件限制的,此时此地的真理用于彼时彼地完全有可能是谬误,甚至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今天的伊拉克就可以提供最有力的例证。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也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4]258}说:“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人类文明因多样而存在,因交流而发展,因互相学习而进步。美国的发展经验是美国人民在本国国情条件下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复制,照单全收,他们都对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经验学习交流。这些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性也非常大,在本国发展道路的演变中,也反映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的认识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就带有明显的优越感,认为科学的发展话语非他们莫属;其他不合乎其价值标准的发展经验都应该作出自我批评,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发展经验。所以,“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也是对人类文明认识态度的不正常的退步。

二、中国发展话语对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建构的影响

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来看,世界体系是

具有流动性的,即中心国家可能下降为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也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国家。^[5]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世界体系中存在一定的自主发展空间。“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最主要特征,处于其中的国家要参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各个国家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中心”国家主导了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在其中具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受到压迫和剥削,边缘国家所受的剥削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沃勒斯坦的学术贡献在于不仅仅开创了一种审视人类历史的新视野,最重要的是他基于这个解释框架,对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抱有足够的警惕和批判。”^[6]现代性发展主义话语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延续了西方殖民主义关系的意图,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缺陷。

“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其实就是一种带有西方殖民主义思维的话语表达。从表面上看,这种发展话语以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模板,认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是对这个道路的模仿、学习和复制。但是,从思维逻辑来看,这种发展话语的缺陷在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唯发展论,以及僵化的道路模仿复制说。发展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什么是正当的发展?现代化能够涵盖所有的“发展”内涵吗?答案并不唯一和绝对。在目前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有差异。发展的普遍性与人类需要的多元性存在矛盾,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存在差异性,由此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对于不同的人群和地区来说,立场不同,答案甚至可能绝对相反。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的出现,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收缩战略、石油危机的出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等,使国际关系仅凭理性主义和对权力的核心关注都不能解释。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被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所批判。反思主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国际关系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建构、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性。”^{[7]序}在吸收了反思主义的话语分析后,温特试图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他吸收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又决定从反思主义的本体论进行国际关系的分析,从而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一大进步。温特等人对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发展,从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出了现实的国际关系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建构。

建构主义原本主要用于描述一种认识论立场,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它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审视客观世界,所以得名“建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兴起,并在90年代以后发展为国际关系领域强劲的理论学派。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文化的作用,如共有知识、共有认识或共有信念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不可避免的影响等。温特举例谈到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人和苏联人就有了共有的信念: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7]233}这种文化的自我再造趋势,使国家之间的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能很好地解释现实当中国际关系的一些变化。它从本质上对国际关系现实领域的反思,也使得“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发展话语面临思维范式的质疑。

国际体系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得“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身处尴尬境地。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温特运用建构主义的视角,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国际体系文化类型,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特点是敌意、暴力事件和国家的高死亡率。但是,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低死亡率也说明国际政治发生了质的结构变化,“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逻辑已经被洛克无政府社会的生存和允许生存逻辑所替代。”^{[7]350}同时,也有多元安全共同体格局的国际关系文化显现出来,那就是康德文化。^[8]在这种文化中,非暴力和团队行动已经成为规范,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国家与国家如果出现冲突,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等方式来解决。^{[7]370-373}所以,对于国际体系中文化的理解,可能是如今思考国际关系问题绕不开的认识基础。实践推动着认识的发展,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反思主义本体论的结合,在国际关系领域引起了思考方式的发展和进步。

当今的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仍是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的最大障碍。20世纪的后20年,拉丁美洲国家因其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而并未充分享受到世界发展的成果,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很大比例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这种畸形的发展,其实当地的学者已基本作出解释,如多斯桑托

斯^[9]所言,在这种全球格局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处在一种依附的和从属的地位上。”“尽管做出了努力,但当这个地区还无法控制自己的经济、不能实行一种符合自身需要的发展政策,以克服结构性的依附状态、铲除本地区统治阶级的寡头势力存在及其他的反民族、反人民的从属地位、克服收益和财富的严重集中、克服对劳动力的高度剥削的时候,很明显,这种努力就不能期待得到重大成果。”所以,不管是从“依附论”还是从世界体系理论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位置是事实,“西方中心论”只不过是强化其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优越地位,是从话语认同的高度对其发展的肯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中国发展话语^①应该对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有所作为。我国一直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在国际社会仍旧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我国的发展话语还不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质疑,在世界上的认同度也不是很高。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本来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非常弱,在寻找本国发展道路时又时刻面临外部霸权国家的非难和内部国家民众的误读。所以,本国的发展经验得不到世界的普遍认可,还频频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西方中心论”实质是认为霸权国家的发展经验是真理,别的发展经验都不是真理。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大国来考虑,中国发展话语对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意义非同寻常。“反思或批判理论造就的知识的可用之处是改造世界,而不是在现有世界范畴内进行运作。”^{[7]475}建构主义的出现使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产生动力,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同样使世界发展话语的研究充满了对自身的批判色彩。不可否定地说,如果失去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思主义的本体论,任何的绝对化的观点或主导理论最终只能导致自身的活力缺乏或者理论退步。所以,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的客观性,对于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话语整体上处于劣势,很难说在世

① 中国发展话语是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的话语表达,体现了中国式的发展在国际上和国内影响的话语功能。这种发展以现代化为重要内容,但又不局限于现代化,还包括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发展的时代课题和内容。

界发展话语中产生影响力。中国发展话语的出现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一种声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负有责任。同时,中国的发展话语也是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一元,对于世界多元发展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建构。从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的多样化来看,世界出现多元发展话语是正常现象。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看,研究思维范式的转换也反映了话语在国家关系和世界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国的存在和发展要用自己的发展话语来解读和传播。没有话语权,就没有生存权,也就丧失了发展权。新中国成立后确实曾经模仿苏联模式,但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自主探索本国道路的步伐。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10]中就开始独立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与苏联关系交恶后,进一步在美苏两极格局中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拓展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毛泽东尝试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尼克松得以访华。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了与美国的建交大门,随之全面开放的中国进入了广阔的国际交往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3]397-403}认为“设立经济特区是相当大胆的举措。它也表现出中国愿意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从而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经济自给自足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基辛格作为美国的政府官员,他又感慨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实现它的历史宿命,还是在精神信仰上作出妥协?它应该向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学习什么?”用这样的西方发展话语解读中国,容易出现误读,显然不利于我国发展话语的国际表达。

三、中国发展话语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在表现。关于发展的言语理论表达方式,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与社会权力关系相关,发展话语是一国关于发展的自我认识和国际认可度的反映。发展话语的普遍性在于其是一种存在的表达,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表述,是让世界和其他国家了解本国发展的言语表达,如前所述,发展话语具有话语建构功能。中国的发展话语也是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表述,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话语一样,具有存在的普遍性和一般特征。同时,这种表达本身又是一种多样化的体现和集合,发展话语的建构功能和普遍性又是通过其独特性和个性特征体现

出来的。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11]一书认为,中国有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等。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各个国家的发展话语都有其独特性,世界上国家的发展话语最后会体现为多样化的集合。

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的根本对立到现在仍然存在。从我国的本土环境来说,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话语支持;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社会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冷战之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强国更是强化了其“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利用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影响和渗透边缘国家和地区。在处理与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①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周兴杰^[12]认为:“必须从全球性视角来看待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迫切性。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随着当代传媒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我们必须将文化领导权问题与中国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定位联系起来。”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有竞争、有合作,在对立中协商,在竞争中合作。从全球语境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反而具有“反霸权”的性质。

各个国家发展话语的特殊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用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话语的特殊性去解读别的国家,都不会适用。“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我国在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自身合理的地位和权益。中国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一直在努力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成为中国的执政党,继续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就是党领导人

^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文化、意识形态与政党权力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前必须行使领导权,革命胜利后,也必须继续保持“领导”。他还认为:在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国家暴力机构,但其统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宣传,使群众支持并接受其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在这个一致的形成过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党形成妥协,实现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社会经济和政治从而有了一致的目标。

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成功摸索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大“三步走”又细化为小“三步走”,经历调整和完善,指导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使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中华民族一直热爱和平。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近代化,虽然一直落后,但最终清醒把握了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自身发展目标有了明确认知。中国道路承载的发展理念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学者张维为曾在《纽约时报》撰文,分析了中国成功背后的理念,概括为:“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13]该文章发表时,编辑特地加了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当然,中国的发展理念还在不断丰富,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中国也在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表达出自己的发展话语,习近平在国外演讲时就说,“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4]273}他号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中国发展话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当前中国发展话语的最新概括,符合中国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了对中国发展规律的把握,对于中国开创一个全新战略机遇期具有旗帜的功能,是中国面对新世纪战略机遇期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外国媒体直接把当前中国发展话语概括为“Four Comprehensives”,使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推动中国的发展提出不同的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特定历史阶段发展话语的核心表达,对于推动中国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也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窗口。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4]259}时说,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因而才有交流互鉴。“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了解

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所以,对于别的国家发展经验,交流互鉴是科学的学习态度,傲慢与偏见经常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其关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一直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以指导中国新的发展实践。新的时代和发展实践对于党和国家工作也会产生新的要求,因而,中共领导人坚持适合本国的发展理念,根据本国实践的要求创新发展理念,对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也在不断总结、丰富和完善。从当前的中国发展来看,“四个全面”战略正在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决定性举措,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科学发展理论能否实现的决定性条件。这也是保证中国的发展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元政策的话语表达,具体各个方面的政策执行和措施推进都是以此为方向和标准的。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较为长远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对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务必要“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保证。

四、结 语

也有西方学者对于“西方中心论”并不认同,反而更为注重中西方发展经验的互相学习。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在他看来,“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如果说中国能从国外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其他国家同样也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很多东西。”^[14]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国情都不一样,并不先天存在一种成型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一元论”的发展思维,如“西方中心论”,正是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从思维方式来看,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

世界的一员,国家主动参与其中,要比被动卷入更能占据发展的有利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又是话语建构的关键内容。由话语建构进而实现话语的国内认同和世界认同,进而实现发展的合理性,是发展话语的关键功能。发展话语是关于一国发展的阐释与表达,对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存在、影响以及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属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话语的阐释受到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的影响,但国家在其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又非常必要。所以,中国的发展可以总结和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一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适合当前中国发展特点的发展话语的最新概括,一直努力在世界发展话语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用自己的发展实践使自身的发展话语在世界上得以传播,有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科学地认知中国的发展话语。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与其他国家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公正合理发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实质上就是对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补充和建构。

参考文献:

[1] 唐士其. 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社

会的关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40-341.

[2] 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 徐海铭,季海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4-57.

[3] 亨利·基辛格. 论中国[M]. 胡利平,林华,杨韵琴,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M]. 孙立田,庞卓恒,张永胜,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6] 姚国宏. 话语、权力与实践: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47.

[7]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康德. 永久和平论[M]. 何兆武,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世界经济新趋势与拉丁美洲一体化[C]//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 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 白凤森,徐文渊,苏振兴,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81.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9.

[11]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 中国大趋势[M]. 魏平,译.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12] 周兴杰. 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78.

[13] 张维为. 中国震撼[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6.

[14]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中文版自序.

“West-centered”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WU Miao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est-centered” theory is a typical expression for un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ist dialectic and world system, “west-centered” theory is limited in terms of cognition method, so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will restrict worl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The introd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analysis method makes culture and discourse become the new epistemology basis to analyze world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querying the thinking paradigm of “west-centered” theory,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s of the world is affirmed.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reflects general development law, adapts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embodies unifica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based on development practice dispels “west-centered” theory and embo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West-centered” theory;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s of the world;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王艳娟)